

评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 研究的新著

——《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

• 徐以骅

[编辑说明] 本文原为《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刘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一书所撰的序言。

宗教向来就与国家安全有着不解之缘, 这是由宗教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宗教或宗教信仰可能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生存的核心价值观, 与一般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相比更为持久, 而且更缺乏弹性及不容忍妥协。宗教及其宗教组织一般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跨国联系、使世俗权威相对化以及使暴力合法化的特性, 故宗教问题较易被国家视为安全问题或加以安全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 宗教政治化、国际化以及暴力性宗教极端主义的肆虐, 更是对国家主权和国际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 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业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难以回避的问题。

和宗教与国际关系相比, 宗教其实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人们通常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至上的原则,

从而一举奠定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不过细究起来，这一国际关系“还俗”的过程，远非一蹴而就，得经过一个多世纪才最终成型。庞大的天主教会，尽管开始走下国际关系的“神坛”，但始终是欧洲乃至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政教行为体，而且在欧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较长的时间里仍拥有“国教”身份，在所在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上，自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有甚者，宗教不仅具有组织性，而且呈弥散性，始终是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其实对使西方国家政治观察家和学者大惊失色的当代宗教基要主义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日用而不知”，因此宗教从来就具有超验和属世的双重属性。而国家安全尽管被视为“具有高度世俗性”，但像领土和主权等国家安全要素已经被“把宗教拉下马”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并且像政治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领土等国家安全要素，也不是只有客观性而绝无主观性。因此，被渲染或建构为“具有高度神圣性或高度抽象的宗教”与“具有高度世俗性或高度具体的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并非天差地别，形同水火，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隔着一层尚未被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捅破的窗户纸罢了。

与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一样，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也是各种学科均可染指的研究领域。本人曾经指出，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单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而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宗教与国家安全当然也可以通过

不同的学科路径来加以研究。不过国家安全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议题”，而非国际关系可与其他学科分享的“共议题”，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倚重可能要超过其他学科。

然而，要捅破隔开宗教与国家安全的这层窗户纸，把对该议题的研究建立在学术而非对策研究的基础上，却并非易事。首先，宗教与国家安全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超验与世俗的冲突或张力。如前所述，宗教兼具圣俗两重性，并因此而产生了人文、神学和科学（或实证）三种研究路径。宗教“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面向就与更具实证性的国家安全研究具有不兼容性；其次，缺乏权威数据库、跨国田野调查和民意测验是国内开展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瓶颈。其实在国外，有关数据库，如本书多处引用的“MAR（Minority at Risk）数据库”，涉及的主要是国内和地区性宗教暴力冲突、少数派宗教群体和政教关系如所谓宗教限制及迫害等，主要反映了西方的人权理念和议程。此类统计数据缺乏客观性和权威性，而且需要加以引申和解读才能与国家安全对接。因此开展该领域的实证或量化研究，难度很大；再次，迄今为止的各种安全理论，包括所谓哥本哈根学派，实际上均未正面和系统地处理宗教问题，相关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是隔膜，无法提供现存的分析框架，这当然也为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留有较大的空间；第四，无论在国际关系还是在国家安全中，宗教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中的因变量而非自变量，宗教是与政治、地域、民族、血缘、语言等因素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运动和事件中往往扮演着推波助澜的“催化剂”或“加速器”的角色，如人们很难将本书所提到的波兰共产党政权解体和苏东剧变的根本原

因归之于宗教。因此要在宗教与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之间建立因果链或“因果性影响”，也是极其艰巨的学术探索。

本书是国内学者较全面系统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宗教与国家安全，并试图破解上述难题，将宗教纳入国家安全研究、以及将宗教与国家安全议题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理论框架的一部最新专著。本书的国际关系理论辨识度、分析的完整性以及对宗教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参悟，在相当程度上均对此前的研究有所超越。本书作者从国家文化、威胁判断、意识形态和国际互动四个研究假设出发，通过妈祖崇拜、中国政教关系以及“东突”恐怖组织三个案例，来阐述或从理论上确立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内在关系，并试图搭建一个宗教与国家安全互动的分析框架。如果要批评的话，那么作者此四个解开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奥秘的研究假设尚需完善，目前可能更基于国外而非本国实践，或更适用历史上政与教、教与教相互对立的西方，而不太适合政与教、教与教相对通融的东方。如在第一个研究假设中，尽管作者试图用“宗教文化”来稀释宗教或扩大宗教的外延，但我们很难说目前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认知路线图”基于或源于宗教及宗教文化。此外，本书的研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宗教间冲突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宗教冲突的外溢所造成的国内宗教问题的国际化和国家安全化，似乎并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

本书同样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是论证作为观念的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作者从观念因素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出发，通过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分析模式，来阐述宗教对国家安全兼具因果和建构作用的“本体论”意义。作者认为，理性主义分析模式对国家安全有“路线图”、“黏合剂”和“制度化”的作用；而建构主义分析模式的各流派均支持“观念具有安全

本体意义”的基本认识，通过“安全—身份—安全利益”“观念—规范—安全决策”以及“观念—言语—安全关切”三种分析路径，来揭示观念与国家安全互动关系。而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分析模式，对本书论证宗教对国家安全的能动作用和构建宗教与国家安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基于国际关系理论或社会科学的依据。

本书把宗教界定为“一种认识，是一个由思想、规范和行为组成的观念体系”，从而强调了观念和思想作为宗教内核的作用，在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历史学进路”和“组织学进路”之外另辟了“观念学进路”，这对于我们理解宗教观念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启发性。然而本书对宗教这种非传统的强调观念和思想的定义，不仅忽略了宗教“可能具有的神学、法学、哲学等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下调了宗教的社团性和“社会学属性”。宗教是观念系统，但不等于观念系统：宗教观念不同于一般观念，而更多是超验的观念；宗教不仅是神学、教义和观念系统，而且还是社会系统。如抽去超验性和社会性，哪怕是被描述为“社会共有观念”，宗教恐怕就已不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宗教。如果在本书作者所建构的宗教与国家安全互动分析模式中我们用文化、意识形态或其他观念来取代宗教观念，该分析模式大概仍然是成立的。因此本书对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泛观念化”的处理，颇有些可斟酌之处。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除了理论研究外，宗教与国家安全尤其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在政策层面的运用或对策研究也具有日益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我国学者需要倾注学术责任感来加以关注的议题。近年来，本人在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对策领域陆续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有限安全化。在我国目前的社会

环境和宗教国情下，我国在宗教领域似可采纳某种有限（选择性）安全化的对策，对宗教问题实行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并举、安全与统战并举，以及保持安全线与统战线、政策线与法制线相对平衡的政策；第二，国家安全研究无论在定性还是在对策上都要注重分级管控、区别对待。涉及宗教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三类安全问题尽管有所重叠，但在规模、范围、严重性、破坏性、国际影响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不能相提并论，因此需将个人和一般社会安全问题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以区隔，阻断个人和社会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按程度和性质就事论事地看待宗教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使宗教政策更符合我国“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和“强国弱教”的宗教国情；第三，国家安全有积极、消极之分。消极安全具有被动和防御性，主要着眼于消除安全威胁和隐患；积极安全则具有主动和进取性，着眼于预防安全隐患以及扩大安全空间和手段。因此我国应更自信地开展宗教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在宗教对外关系领域实施积极安全政策，实现国内宗教政策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对接，恢复和盘活散落在海外的我国宗教资产，把统战工作需要协调和处理好的宗教关系与海内外同胞关系放在一起抓，从而构筑中国海外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隐性防线。对策研究和建议是本书理论建构的自然延伸，但显然还可有更创新的思路、更周全的分析和更可行的方案。

本书作者刘骞 2009 年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就职于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工作站和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国内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现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并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

上，经过近7年的大幅修改和精心打磨而最后成书的。作为其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本人对刘骞博士所取得的成绩和本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在此祝愿刘骞博士在其专攻的国际政治安全理论、宗教与国际关系、美国政府和政治等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